

# 川端康成《千羽鹤》的伦理价值论

## The Ethical Values of Kawabata Yasunari's *Thousand Cranes*

李俄宪 (Li E'xian)

**内容摘要：**《千羽鹤》是川端康成 195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代表了他一贯的文学理念和美学思想。对这部作品研究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呈现出善恶两端的价值判断现象。三岛由纪夫、山本健吉和梅原猛等日本研究者基本上在唯美主义、罪恶意识、人性救赎、官能审美等角度审视其作品的价值。以叶渭渠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基本上集中在对该作品的美学探究和宗教魔界意识研究，与日本学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以川端的诺奖获奖词为切入点，运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重读《千羽鹤》文本，发现川端康成是借用日本传统美的背景和氛围，表达他更为深沉的伦理思考和对人类的关心，从伦理和道德层面赋予了作品特殊的主题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千羽鹤；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意识；伦理选择；伦理价值；

**作者简介：**李俄宪，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本文系全国社会科学规划 2013 年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 & ZD128】中期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Values of Kawabata Yasunari's *Thousand Cranes*

**Abstract:** *Thousand Cran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Kawabata Yasunari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52. The novel reflects Kawabata Yasunari's consistent literary and aesthetic thinking, yet so far it has garnered rather varied, and even totally opposite comments and value judgements in the academic field. Japanese scholars such as Yukio Mishima, Kenji Yamamoto, and Takeshi Umehara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value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ism, sense of sin, salvation of humanity, and erotic aesthetics, while Chinese scholars, with Ye Weiqu as the representative, similarly focus their discussion on the aesthetic inquiry into the novel and the idea of the world of devil reflected in it. This article takes Kawabata Yasunari's Nobel lec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reinterpret the text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e Zhenzhao'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is novel Kawabata Yasunari borrowed the background and atmosphere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beauty to express his deeper ethical thinking and concern for humanity, which endows the novel with special themes and literary values in terms of ethics and morality.

**Key words:** *Thousand Crane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awareness; ethical choice; ethical value

**Author:** Li E'xian, is Professor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uhanexian@163.com).

### 问题的切入

《千羽鹤》和《雪国》都是长期在报纸或文学刊物上连载后成书的作品。这部小说共分五章：《千羽鹤》（1949年）《森林的夕阳》（1949年）《志野彩陶》（1950年）《母亲的口红》（1950年）《二重星》（1951年）。小说主要以公司职员三谷菊治和其父亲的情人、茶道传人栗本近子为基本人物线索，描写了菊治与也是父亲情人的太田夫人母女（文子）两代人、以及茶道弟子稻村雪子之间的性爱 and 情爱关系，塑造了菊治、栗本近子、太田夫人、太田文子和稻村雪子等复杂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战后日本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混乱的人际关系和命运结局。对于这部小说，自发表到现在，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川端研究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甚至呈现出善恶两端的价值判断现象。

先行研究中对川端康成高度评价的三岛由纪夫认为，这部小说是仿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即唯美主义和审美文学的极端甚至超越，进而认为川端为了塑造古典美的形式，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仅仅的人际关系，而是更加深刻的长期沉淀的活生生的肉感的人际关系（三岛由纪夫 658-674）。山本健吉则通过太田夫人的毁灭之美极力强调这部作品的罪恶意识和虚无主义表达（山本健吉 282-287）。而梅泽亚由美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菊治和文子罪恶意识的结果在于某种意义上的救赎，整部作品其实就是菊治自我净化和漂白的物语故事（梅泽亚由美 51-60）。著名哲学家和评论家梅原猛虽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川端作品整体的伦理意识与官能审美的对立与矛盾，但最终还是落脚在佛教的魔界意识，强调了川端文学佛教要素（梅原猛 29-98）。更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千羽鹤》的主人公菊治来说，女性也是与传世的珍贵茶道道具有相同意义上的存在，作家川端康成的的确确不是女性赞美者，而只是一个女体嗜好者（川至 172-183）。日本研究者基本上在唯美主义、罪恶意识、人性救赎、官能审美等角度审视作品的价值，甚至部分地否定作品的艺术和思想价值。

中国国内，叶渭渠为代表的研究者基本上集中在对该作品的美学探究，

叶氏指出，川端康成试图在小说中超越世俗的道德规范，创作一种幻想中的美、超现实美的绝对境界（叶渭渠 78-79）。孟庆枢则从思想、文化、审美和宗教等多角度论证，认为《千羽鹤》的主题是日本的传统美，是洗涤人类灵魂的唯一途径（孟庆枢 44-51）。其他一些研究者更多持有日本学者的观点，基本上不承认作品的伦理和道德因素及其价值，从宗教、从川端自述的魔界思想入手展开讨论。如李均洋认为，《千羽鹤》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小说美学之花”（李均洋 72-78）。吴永恒认为，川端康成试图在充满官能欲望的魔界寻找真和美（吴永恒 78-82）。更有李伟萍认为川端试图通过走入魔界，来摆脱一切道德的抑制，获得再生（李伟萍 191-194）。只有魏威肯定了《千羽鹤》的伦理因素和道德的胜利，但他同时指出：菊治在道德战胜情欲后，反而更颓废了，难道不是反证出官能之美还是比道德重要吗？（魏威 140-141）凡此种种，基本上没有突破日本学界的评论框架。

但是这里最有必要提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者川端康成对自己这部作品的评价和认知。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中，饱含深情地几乎用整篇的篇幅对日本的美学理念、文学追求和审美特质做出细致的论述的同时，唯独对《千羽鹤》做了这样的表述：

（前略）“雪月花时最思友”这也是日本茶道的根本之心，茶会就是这一根本之心的“感会”，即吉日吉时好友同事相会的宜佳之会。随便说一句，我的小说《千羽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日本茶道的“心灵”与“形式美”，那就错了，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表露出的怀疑和警惕，并对其予以否定。（后略）（川端康成：348）<sup>1</sup>

这里，川端康成直截了当地指出，《千羽鹤》是对战后日本社会的低级趣味的所谓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描写日本的传统美。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川端本人的话作为判断这部作品主题和价值的唯一定论而否认其他角度的解读，更不能否定作品与日本传统美的密切关联，因为批判本身也是重要的关联，但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这篇小说的最为重要的关键点和切入点。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川端康成在作品里不是对日本传统美的简单的褒扬和推崇，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质疑，带有更多的对当时日本社会的传统认识的警惕和戒备、甚至是否定。本研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里，从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重读《千羽鹤》文本，就会发现作品中人物都具有清晰的伦理意识，而这同时又陷入伦理困惑和伦理混乱，最后不得不做出伦理选择这样一个过程，这在整个作品的文本结构中以及具体的细节描写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源自文本的印证。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川端康成全集》第28卷，新潮社，1982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译文由笔者自译，以下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本身从起源上就是伦理的产物，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伦理教诲功能。只要是文学，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教诲都是它们的基本功能（聂珍钊 7）。概观整个《千羽鹤》的创作酝酿和发表年代，甚至我们可以说，川端康成是借用日本古典之美或者说传统之美的背景和氛围，来表达他更为深沉的伦理思考和对人类的关心，从伦理和道德层面以及角度赋予了作品特殊的或者说更高层次的主题和文学价值。

### 一、伦理环境与伦理结构

《千羽鹤》的创作和发表都在在日本战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是日本战后的经济与文化的恢复期，整个社会混乱、价值迷离，不仅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各种社会思潮也是相互泛滥，战前和战时培养的价值观念变得分崩离析，丧失了原有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同时又对战后新旧势力交错的现实局面感到非常迷惘、不安和无助。这就是《千羽鹤》这部作品大的时代的伦理环境，只有在这个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我们才能够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对作品进行客观的伦理阐述。川端在作品中也不断强调日本遭受空袭的战争回忆，包括太田夫人向菊治回忆文子冒着被轰炸的的危险送三谷回家、空袭中为三谷买菜做饭（川端康成 254-255）等描写，都是在提醒读者，故事发生在战后的伦理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的时代伦理背景下，作品中的菊治为核心的人物关系的伦理环境才更显得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菊治从小生活的伦理环境就是复杂而又混乱的，父母貌合神离，母亲孤独中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作为茶道师的父亲又同时与栗本近子和太田遗孀保持偷情关系，而且毫不避讳还是八、九岁儿童的菊治，使得菊治毫无防备地看到了父亲的情人栗本近子胸部的巴掌大的、长者黑毛的黑痣：

大概是菊治七八岁的时候，被父亲带着到近子的家里去玩。结果看到了近子在茶室里敞胸露怀，用一把小剪子在剪黑痣上的黑毛。黑痣长在左边乳房，占了半个乳房的面积，而且还在往胸口窝扩展。整个有巴掌那么大。在那黑得发紫的黑痣上面好像长出了黑毛，近子正在用剪子夹住那颗黑毛。（中略）

展开在近子膝盖上的报纸上，散落着好像男人的黑胡子的东西，也被菊治看到了。虽然还是正上午头上，却听到老鼠在屋顶棚上吱吱乱叫。屋檐旁边的桃花正在开着。（中略）

菊治对父亲装作没事人的样子感到一种义愤。连菊治自己都看到了近子的那颗黑痣，菊治对父亲无视自己的存在和感受也感到了一种憎恶。（中略）

另外，菊治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想起了当时母亲的话，如果真的喝着长着那颗黑痣的乳房的奶水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或者弟弟出生了，那将会是怎样的可怕啊！他感到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惧。（川端康成 248-249）

这就是作品中人物群体的具体的伦理环境。第一章在不到两页纸的空间里，居然在描写栗本近子与其他登场人物关系时，牵扯到乳房上那巴掌大的黑痣，使用“黑痣”一词共 25 次，而整个作品前后贯穿的文本中共出现“黑痣”43 次之多，这在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中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明显是在通过黑痣外观的象征性给读者强调了菊治从小生活的伦理环境是多么丑恶、矛盾、畸形、异样、是多么混乱。最应该是展示传统美的“雪月花时最思友”茶室，却成了完全不顾女人的羞涩和矜持、甚至基本的为人的礼貌和修养的近子敞开胸怀、用剪子修剪自己黑痣上黑毛的场所，而所谓的茶道和所谓的传统文化也都被这象征着丑陋的黑痣全面覆盖和污染，传统美荡然无存。

而这之后，作品中的重要人物登场场面，尤其是茶室聚会，纪念菊治父亲三谷的纪念会，稻村雪子与菊治的婚姻介绍见面会，等等都是这个胸部有着巨大的丑陋黑痣的人近子组织和参与的，所谓传统茶道、传统服装、传统仪式等等都笼罩载全文四十三处的黑痣阴影中。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认为，这里确切地清晰地印证了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对所谓日本战后传统美的讽刺和批判，是对日本战后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表露出的怀疑和否定。

于是，在这样大的时代的伦理环境和具体的作品人物群体的伦理环境中就形成了明显的伦理结构。伦理结构指的是文本中以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伦理结构有四种基本构成：人物关系、思维活动（包括意识结构和表达结构）、行为和规范。人物关系主要指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聂珍钊 260）。主人公菊治同已死的父亲三谷和栗本近子以及太田夫人母女的关系就是一种复杂的伦理结构。这个人物之间的伦理结构，其实也是上述大的时代伦理环境和具体人物间的伦理环境的具象化。它的作用在于，因为菊治与太田夫人的相遇，形成了父辈偷情基础上的双重乱伦，造成了菊治和太田夫人母女的伦理困境和伦理两难。从而也就形成《千羽鹤》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的伦理现场和最基本的艺术构架。

## 二、伦理身份与伦理意识

那么，《千羽鹤》中基本的伦理结构中的人物群体，即便是在战后一片混乱的现实中，有没有伦理意识，伦理身份是否清楚呢？或者说伦理意识是不是清晰的呢？这是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伦理解读的关键所在。可以认为，作者川端康成的伦理意识以及作品中登场人物的伦理意识，都非常鲜明的在



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无论是父辈的三谷与栗本近子和太田夫人偷情关系的描述，还是三谷夫人与丈夫的两位情人之间伦理身份的描述，都清晰地展现着相互之间的伦理性特质。菊治与太田夫人以及其女儿太田文子的双重乱伦关系描述中，更是凸显了叙述者川端康成与登场人物的清晰的、甚至是故意夸张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这一方面表现在人物关系交流中使用的语言特色上，另一方面表现在陷入不伦和乱伦中人物的伦理自责和道德负罪感上。

从菊治第一次见到太田夫人，对于太田夫人对自己的注目和温情有所反感，尤其是知道太田夫人故意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待自己时，就使用了不太符合日语习惯的表达方式。“那么您的女儿知道她的母亲您在这里等候着我吗？（それでお嬢さんは、お母様が私をお待ち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御存知なんですか。（川端康成 254）<sup>1</sup>另外，像“因为在下的父亲活着的时候让您的女儿受了很多苦”（私の父は、お嬢さんを随分苦しめたんでしょから。）（川端康成 254）。这里几乎是故意地突出了人物间的伦理身份。更有甚者，作品中菊治与太田夫人乱伦之后，夫人问起菊治与雪子是否结婚的事情，菊治答非所问地回答到：

给我作介绍人的栗本，你知道的是我父亲的女人啊！那家伙经常因过去的怨恨出口伤人。你是我父亲的最后的女人，我认为我父亲还是很幸福的啊！

（仲人をするという栗本だって、父の女ですよ。あいつは過去の毒気を吹きかける。あなたは父の最後の女だが、父も幸福だったと、僕は思いますよ。）（川端康成 267）

等等，这些清楚表达人物之间伦理身份、亲属关系、血缘关系的单词和语句全文本 351 次之多，因为日语尤其是在使用敬语·自谦语和借助授受动词表达的时候，日常会话中，是尽量不用我·你·他这类主语词的，而作品中这些表达句子，不但用了不必要的主语，更是使用的大量的敬语，就是因为这里的作品主人公清晰的伦理意识，使其故意使用敬语和表明伦理身份的主语，无论作者川端康成写作时有没有这样的用意，但是作为读者，根据语言特点可以读出这种表达内涵。其他如“未亡人”即汉语的“遗孀”等等表明对方是结婚后失去丈夫的寡妇等词汇也是频繁使用，因此伦理纲常的种种限制和伦理界限就越发清楚，言行举动等等都会受到相应的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的约束。总之文本中表示伦理身份、伦理界限和伦理禁忌的词组和句子不胜枚举，充分表现了作者本人和作品中人物的伦理意识是何等地清晰。

另一方面，作品的登场人物中，从菊治到太田夫人和太田文子都充满了

1 为便于两种语言的确认，故此引用日文原文，以下同一。

不伦和乱伦后的自责和忏悔，表现出了明确的罪恶意识，这在三个人物的乱伦前后的对话叙述和各自的心理活动描写中随处可见。鉴于如前所述的先行研究中已有了大量的论述，在此不做赘述。简而言之，作品主人公等的大量自责、忏悔和罪恶意识本身就是伦理意识清晰、甚至故意夸张凸显的伦理意识的最好证明。

日本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梅原猛（1925年出生）在日本精神史、古代史、文学、宗教等领域都具有独创性思索。他以佛教为中心，对日本人精神性所进行的独特研究被称为“梅原日本学”，他与川端康成生前有过几次密切交往和接触，并自称川端康成的文学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基于他对川端的了解，他曾经这样评价川端及其部分作品：

我少年时代读过的他的作品虽然只到《雪国》为止，但是无论《伊豆舞女》还是《雪国》这些战前的作品都是很健康向上的。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几乎很少有人指出过，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川端康成是一个伦理观念非常强烈的人。他这强烈的伦理观念首先是来源于他天生的无私的精神，其次，当然这也可能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受到人们尊重的原因：他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意识有意地、适度地抑制了他战前的作品中那为所欲为的官能性的、肉欲的审美意识。（梅原猛 32）

这里，虽然梅原猛主要试图论述战前战后川端作品中官能描写的比重不同的，但是对川端伦理观念之重和伦理意识之清晰的评价是鲜明且准确的。这也是在日本学术界最清晰最肯定地指出川端康成伦理思想和伦理意识浓厚的论断，也是我们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和视野解读《千羽鹤》的重要依据和可能性所在。

### 人物群体的伦理混乱

毋庸置疑，《千羽鹤》中主要人物都具有非常清晰的伦理意识，而人类拥有清晰的伦理意识后就不会发生伦理错误和伦理混乱了吗？显然不是，即便是有着清晰的伦理意识，但是伦理身份的改变或者伦理结构的改变就会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认为，“既有秩序遭受破坏“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巧合”误解等，也同样属于伦理混乱，在文学作品中，伦理混乱的价值在于增加文学性和提供道德警示”（聂珍钊 258）。《千羽鹤》中描写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主要登场人物的伦理混乱。如作品中详细地描述了近子主持茶会的参加者所属以及他们与主人公菊治的关系，诠释了第一章中伦理混乱的详细情况：既有纯洁无瑕的身着“千羽鹤”的小姐雪子和文子，更有太田夫人、近子以及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茶道道具“黑织部烧”茶碗。而这只茶碗正好揭示了人物之间的混乱关系，象征和暗示出了极度的伦理混乱。

淑女面前的茶碗，菊治也有清晰的记忆。那是父亲从太田遗孀那里接受的赠物，所以父亲一定使用过。看着死去的丈夫遗留下来的爱物被菊治父亲交给了（情敌）栗田近子，又被在这样一个茶会时摆在这里，太田夫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只碗的呢？（中略）

从死去的太田之手到太田遗孀手里，又从遗孀之手到菊治父亲手里，再从父亲之手到近子手里，，，于是太田和菊治父亲这两个男人都死去了，两个女人都坐在这里。只看这过程本身就可知道，这是一只暗示着多么奇怪命运的茶碗啊！

这个古老的茶碗，今天在这里又被太田夫人的令爱、近子、稻村家淑女、还有其他到场的淑女们，（一个个）用嘴唇亲吻（触碰）、用手来抚摸。

“用那只茶碗！我也想来一炮茶！因为刚才我用的是别的茶碗”太田夫人突然有点出人意料地、冷不防地说了一句。

菊治又一次感到无比惊讶。这是个老好人呢！还是不知羞耻啊！看着旁边一直低头不语的太田家的淑女（文子），菊治觉得十分可怜，简直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川端康成 252-253）

这里，作者特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警示读者伦理混乱到何种程度。一只代表着日本传统文化的黑织部茶碗，从千利休的桃山时代到现代的传世之作，却因现代人伦理秩序的破坏，集中而又形象地展示了作品中人物群体的伦理混乱：茶碗的原始所有者太田死后，传给了妻子太田夫人，而太田夫人又把它送给了情人三谷，三谷又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弟子情人栗田近子，而胸口有巴掌大黑痣的栗田近子又把它拿出来在隆重的茶会上使用。于是太田夫妇、太田母女、三谷父子、栗本近子、稻村淑女和其他到场的淑女们，都在同一个空间里用各自的嘴唇吻碰着、用各自的手抚摸着这只命运般的茶碗。道德、伦理、秩序、恩爱、羞耻、亲情和爱情等，都在这只茶碗里馄饨污浊在一起了。

其他伦理混乱的登峰造极的描写，在作品中还比比皆是，如“巧合”误解或者神情恍惚、时空错乱等等像日本从古至今的“物纷”<sup>1</sup>的美学理念一样，展示了源自人类天性本身的伦理混乱。

为什么与夫人成了现在这个状态，菊治无法清楚理解。因为一切是那样的自然而然。用夫人现在的话说，好像因为诱惑了菊治感觉到很后悔，其实不仅可能夫人本来就没有打算诱惑菊治，同时菊治本人一点也

1 参见王向远：“日本‘物纷’论：从“源学”用语到美学理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4）：86-91。



没有被诱惑的感觉。另外，从心情和感觉上讲，不仅菊治没有抵触，就是夫人也没有任何抵触。可以说，这里没有任何道德的影子出现。（川端康成 237）

发生了乱伦关系的菊治与父亲的情人太田夫人两个人，都处在一种神情恍惚和时空错乱的状态，虽然两个人都具有清晰的伦理意识，但是对情人的怀恋和对父亲的感觉寻找、以及母性母爱的向往还有太田夫人的女性魅力等等，在巧合或者误解等因素作用下，恍惚之间出现了上述男女两代人 20 岁悬殊的伦理混乱。

不仅如此，作品的整体构造就十分明显地表明，川端康成是在有意识地为主人公设定伦理困惑和伦理混乱的布局。正常情况下就像在第一章《千羽鹤》各节的结构一样，作者正面描写菊治与各位父亲的情人以及情人之女的会面和交流，但是在第二章《森林的夕阳》中，第一节描写到了近子撮合下与稻村雪子见面的场景，但具体见面的内容没有叙述，而是在第二节里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与稻村小姐的交流和内心活动，而这种回忆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断，更可以随时增加进来突发的事件，于是，当回忆到菊治与稻村小姐深度交流，甚至谈到与稻村小姐结婚，谈到菊治讨厌作为婚姻介绍人的栗本近子的内心苦恼，并指出这完全是命运所致，不可抗拒的节点上，为爱情的折磨无法生活下去，挣扎着生病虚弱的身体，躲开女儿文子的劝阻，到菊治家里对菊治倾诉相思之苦、泪流面面的太田夫人出现了。

于是同一间茶室里菊治和他的父亲的情人栗本近子、同时是父亲也是自己情人的太田夫人、以及自己的婚姻对象稻村雪子在相同的空间里依次相见，各怀尴尬，浓烈地绝妙地展示了伦理的困惑和伦理的混乱。而这些恰恰是群体人物最后不得不进行伦理选择的文本基础所在。

#### 四、伦理两难的悲剧性伦理选择

作品中充分地展示登场人物的伦理困惑和伦理两难，这是伦理选择时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伦理价值所在。因为人物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伦理困境和伦理两难中才会出现真正的悲剧性伦理选择。菊治在太田夫人自杀后，似乎放弃了与稻村雪子结婚的打算，与文子发生了乱伦关系，主观上选择了与文子生活下去，可是文子的出走使他又陷入了迷惘。文子则在无法忍受的伦理困惑后摔碎母亲使用过的茶碗，打算与菊治相互搀扶度过人生，但是却又难以再次面对乱伦的现实，最终选择音讯全无地离家出走。而太田夫人最后的伦理选择最为复杂、最为典型因而也最具有悲剧性。

关于这一点，作品中通过人物菊治本身提出过太田夫人的自杀原因问题，“夫人是因为无法逃避负罪感而死的呢？还是因为无法抑制乱伦的爱情而死的呢？菊治困惑地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川端康成 269）。这里其实是一

个伦理的困惑和两难境地中的死亡选择。没有爱就没有偷情的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并不是根本死亡原因，因为如果是负罪感的话，太田夫人在自己丈夫尸骨未寒的时候就与菊治父亲三谷偷情，到后来与菊治相见仿佛遇到了昔日情人，情感混乱发生乱伦之情，直到到去世前都没有极度罪恶的感觉，反而是某种留恋不舍与犹豫不决；当然太田夫人也不是因无法抑制乱伦的爱情而死，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误解，因为太田夫人不需要过分地抑制自己的爱情。父亲三谷的时候没有，儿子菊治的时候也没有，反而还更加享受这种过去的回忆与现实爱恋融合在一起的爱的世界，例如，当菊治与太田夫人发生肉体关系后有一段两个人的对话，夫人很怀恋地谈起了菊治父亲和自己的恋情，还有三谷对女儿文子的父亲般的爱，菊治感到了莫名的憎恶和警戒：

但是，夫人不但没有丝毫憎恶和警戒的感觉，反而还表现出了精神的完全放松、温情脉脉、十分怀恋的样态。

女儿文子之所以对菊治父亲三谷友好相待，其实完全有可能是对母亲同情，不忍心坐视不管而已。菊治认为，夫人看是在说女儿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在述说自己与三谷的爱情。

夫人可能是想诉说自己满腔的情爱，但是至于诉说的对象，用一句极端的话来说，她没有分清是菊治自己还是父亲三谷。明显地可以感觉到夫人是对着菊治，倾诉着她对父亲三谷的无限的眷恋和爱意。（川端康成 255）

也就是说，单纯的偷情、复杂的不伦和乱伦虽然可能使太田夫人有负罪感，但她不会因此抑制自己的情爱，更不会因此而自杀。上面的这段对话描述，就是在自己乱伦对象菊治怀抱里怀恋自己与其父亲三谷的不伦恋情，而且还牵扯到自己的女儿文子。这里既没有负罪感，更没有对自己不伦和乱伦的抑制。

因此，太田夫人的自杀，其实是一个伦理的困惑和伦理两难境地中的死亡选择。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太田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前面论述到负罪感和无法抑制的乱伦爱情都不是根本原因。丈夫太田死时她没有自杀、爱人三谷死时她没有自杀、与菊治陷入乱伦时她没有自杀、被女儿责备乱伦时她还没有自杀，但是，自己成了菊治的婚姻幸福的障碍时，她义无反顾地自杀了。

简而言之，多重的伦理混乱与伦理困惑造成了太田夫人伦理选择的困难与不可能，最后只能是以死结束这种生不如死的伦理两难的极端状态。这也是太田夫人的真正死因。作品中在太田夫人自杀后，有一段菊治和栗本近子的对话，某种意义上强调了太田夫人的真正死因：

“菊治君，你和雪子谈婚论嫁的事是你自己告诉太田夫人的，对吧！”

菊治虽然事先想到了她可能会这么说，但还是气愤至极：

“跟太田夫人打电话，说我和稻村雪子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难道不是你吗？”

“是！是我通知的！而且我还说了，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扰再来捣乱了！太田夫人就是在我电话通知她的那天晚上自杀的！”

俩个人都沉默了。（川端康成 278）

如上所述，太田夫人恰恰是被栗本近子通知参加菊治与雪子的见面定情会后，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乱伦会影响到菊治与雪子这对年轻人的人生幸福，成为他们追求幸福的障碍，于是她不顾廉耻、不顾女儿的劝阻，冒雨直接找到菊治，再次亲自确认后，当晚自杀身亡。因为她不能舍弃对三谷父子两代人的爱，那比他的名誉和生命还重要，但当她认识到自己存在和爱会影响爱人菊治的幸福婚姻时，她就放弃了自己名誉和生命，也可以说这是太田夫人在不伦和乱论之后进行的伦理高境界选择：舍生取义。当然这个义不一定是太田夫人的主观追求，对她来说这个义可能就是她的爱本身。

正像聂珍钊在论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延宕和死因时的论断那样，“他能不能不杀死母亲的丈夫、自己的继父而不犯罪？这是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需要哈姆莱特作出回答，然而他无法做出回答，只能不断地思考并让自己深陷伦理两难困境的痛苦之中，并最终导致自己的悲剧”（聂珍钊 133）。不杀继父，只是没有完成父仇子报的家庭伦理义务，而杀了继父，又会碰触谋杀国王和母亲之夫的国家政治的伦理大忌，最后只能在多次的延宕之后，舍弃生命，完成了自己人生和时代的悲剧。太田夫人同样陷入了自杀舍不得一生的爱，不自杀会破坏爱人的幸福的极端的伦理两难，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的结果导致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选项，从而出现伦理两难和伦理悖论，逻辑悖论是绝对无法解决的，而伦理悖论不是绝对的，无论结果怎样都会得到解决。而无论解决的结果如何都能给读者带来有益思考和道德启示，太田夫人自杀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此。

### 问题的结论

作品全文分为五章《千羽鹤》、《森林的夕阳》、《志野彩陶》、《母亲的口红》、《二重星》，如果是像部分学者的观点那样是表现所谓官能美和肉欲美的话，完全可以选用《森林的夕阳》和《母亲的口红》做小说的题目；如果作品主题是表现所谓日本传统美的话，完全可以选用《志野彩陶》和《二重星》做小说题目，但是作者选择了用《千羽鹤》做总标题。

众所周知，制作和赠送千羽鹤是日本文化的一种传统，用来象征对和平的祈求和对幸福的向往，而川端康成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千羽鹤”一方面是为了张扬日本文化，而另一面不正是想通过作品中人物从伦理混乱、伦理困感到伦理选择的过程来告诫人们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的重要性吗？错误的伦理选择就会给人类带来人生的悲剧命运：早死、自杀、丑陋、自责、自我流放和罪恶意识的无边痛苦等事实，表明了作者对人类的告诫、期冀和祝福。作者没有因为不伦和乱伦等反伦理反道德的行为而抛弃人类，反而在告诫和警示人类之后用象征和平幸福的千羽鹤来祝福人类。

不是因为有了清晰的伦理意识，人们就会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而往往是在具有清晰地伦理意识的同时，人类与生俱来的兽性因子（聂珍钊 36-42）和情欲追求的作用，产生错觉，陷入伦理混乱和伦理两难，从而产生悲剧式命运结局，就像作品中人物菊治、太田夫人以及太田文子。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生活中这种人物模式更具有伦理警示和教诲作用。

伦理价值是正面道德价值与反面道德价值的总称。伦理价值除了包括所有的道德价值在内，还包括非道德的价值，如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和坏人形象。虽然就这些人物的品质和行为而言是缺少道德或不道德的，但是他们仍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这就是从反面提供教诲（聂珍钊 258）。就如作品中的栗本近子和菊治父亲三谷，栗本近子以及她胸前巴掌大的带毛的黑痣，几乎就是作品中恶俗的现实和道德败坏的象征性存在。

日本学者久松潜一认为“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须的秩序就是伦理、就是道德。因而，离开了人的生活，就不存在伦理，所以人类成长形成人格等是文学的基本课题，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文学与伦理有着密切的深刻的关系。文学与伦理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本质性问题”（久松潜一 238）。《千羽鹤》中的伦理叙述，就是直面了文学这个本质性问题，凸显了东方文化和东方文明的特色，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和了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融合，从而实现了川端文学的普遍性、民族性以及世界性意义。而他又同时又通过这部作品对现代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表露出怀疑和警惕，并予以否定，对传统的东方文化给予弘扬，从而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发出警戒和忠告，进而发挥了文学的教育和教诲作用，实现了其文学的思想艺术的最高价值。

### Works Cited

梅泽亚由美：“从千羽鹤到波千鸟——川端康成追求的目标”，《日本文学志要》7（1998）：51-60。

[Yaumi Umezawa. “From *Thousand Cranes* to *Thousand Birds* - the goal pursued by Kawabata Yasunari.” *Summa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7 (1998): 51-60.]

梅原猛：《美与伦理的矛盾》，《梅原猛著作集 19》。东京：集英社，1983 年。

[Takeshi Umehar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Beauty and Ethics, The Collection of Takeshi Umehara 19*, Tokyo: Shueisha Inc., 1983.]

川至：“沉湎于美——从《千羽鹤》到《睡美人》”，《川端康成的世界》。东京：讲谈社，(1969): 172-183。

[Kawa Takeshi. “Sinking in the beauty - From *Thousands Cranes* to *Sleeping Beauty*.” *The World of Kawabata Yasunari*. Tokyo: Kodansha, 1969, 172-183.]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 37 卷》。东京：筑摩书房，1955 年。

[Kawabata Yasunari. *Kawabata Collection, Complete Work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37*. Tokyo: Chikuma Shobo, 1955.]

久松潜一：《国文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 年。

[Hisamatu Kenichi. *National Literature*,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Conference, 1954.]

三岛由纪夫：《日本的文学 38 川端康成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64 年。

[Yukio Mishima. *Japanese Literature 38 Kawabata Collection*. Tokyo: Chuko, 1964.]

山本健吉：《解说》。东京：千羽鹤文库，1989 年。

[Yamamoto Kenji. *Interpretation*. Tokyo: Thousand Cranes Library, 1989.]

李均洋：“我就是佛——《千羽鹤》茶心·禅心美学论”，《外国文学评论》1 (2008): 72-78。

[Li Junyang. “I am the Buddha — *Thousand Cranes Tea Heart and Zen Heart Aesthetic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08): 72-78.]

李伟萍：“《千只鹤》：“净化灵魂的物语”，《世界文学评论》2 (2010): 191-194。

[Li Weiping. “*Thousand Cranes: Story which Purchasing the Soul*.”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2 (2010): 191-194.]

孟庆枢：“千只鹤的主题与日本传统美”，《外国问题研究》3 (1999): 44-51。

[Meng Qingshu. “The Theme of Thousand Cranes and the Traditional Beauty of Japan.” *Research on Foreign Issues* 3 (1999): 44-5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魏威：“读《千羽鹤》”，《外国文学研究》1 (1987): 139-140。

[Wei Wei. “Reading Thousand Cran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1987): 139-140.]

吴永恒：“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千羽鹤》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 (1993) : 78-82。

[Wu Yongheng. “Expressing Truth and Beauty in the ‘Devil’s World’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ousand Cran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1993): 78-82.]

叶涓渠：“结合东西方的川端康成”，《上海教育》3 (2005) : 78-79。

[Ye Weiqu. “Combining the East and West: Kawabata Yasunari.” *Shanghai Education* 3 (2005) : 78-79]